

“梅花香自苦寒来”：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重新出发*

钟玉莲

Abstract

Like all Chinese residing overseas,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through perseverance and endeavour, has evolved into a "self-sufficient" community. This "self-sufficiency" is not confined only to economic life in which achievements are considerable, but embraces a wider area of concern pertaining to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ing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Malaysian Chinese live and implications particularly on issues touching up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one provides a survey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reference to the rol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milieu in a colonial setting. Th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major post-independence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light of consensual politic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emphasizing measures intent on uplifting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The final section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1990s and a prognosis of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context of "Vision 2020".

* 本文是作者在1995年9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华人研究所主办“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上提呈之论文。

钟玉莲 美国史丹佛大学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主任。

一、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的成长与文化特色

在二次大战以前，东南亚各国，除泰国之外，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其时主要来自华南各省的移民都在殖民地政权下，通过一番奋斗和经营，各自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些华人社会（华社）固然在经济上获得相当的成就，但自给自足的涵义不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各个华团都具有社团、报社、学校、寺庙、宗祠，可以不假他力发展并传承其族群文化。¹

造成这种情况有几个因素：第一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以便攫取殖民地的资源，殖民地当局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一般上以放任的态度让各民族处理其文化及教育事务；第二、各地土著社会之民族主义意识不强，而且对各种事务不具发言权；第三、华族人口日渐增加并且集中于市区，有助于各种文化及教育体制的建立；第四、华族移民尚具落叶归根的意识，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

和东南亚其他各国的华社比较，当时马来西亚（战前称马来亚，包括马来半岛及目前的新加坡共和国）的华社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取得了最佳的成就，是一个最具活力的海外华人社会。

在英国统治之下，华人遵守殖民地的法律，但在政治上认同于中国，认为自己是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华侨）；中国政府、殖民地政府、马来社会都了解这种情况。作为中国人，他们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的革命事业，以及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曾经出钱出力；可见二战前马、新华人政治认同以及爱国意识的强烈。²

在文化上由于也认同于中国，华社对教育，尤其是母语教育，非常坚持。先是私塾，后是近代的学堂及学校，一间一间地，在他们聚居的地方，无论大城或小镇，建立起来。这些华校的设立及发展全靠华社本身，政府的津贴与监督是较后的事。这些华校聘用来自中国的教师，采用中国教育部所规定的课程，以及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学生除了学习中华语文与文学，也学习中国历史与地理。在二战前，在吉隆坡、檳城等大都市已有华文中学之设立（Gwee 1972）。

华文教育对其时的华社具有几项功能：主要的是由于以英语为教学媒

介的学校只设立在几个主要城市，且为数不多，华校是华人子弟受教育的主要管道，它为殖民地社会及华社本身培训人材，而华族也因教育水准较高成为殖民社会最有活力的族群；华人子弟有机会学习母语母文，而保留了民族的主要特征；除了语文之外，华文教育有效地把华族的传统与价值传给年轻一代，加强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华族在其他文化领域的建设，诸如文学、艺术、传播媒体（主要是报章、杂志），也因教育水准的提高而呈现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华文教育对民族文化及地位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但华社却有分化的现象。一部分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华人因在以英语为媒介的学校（英校）受教育而不通华文。这些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在殖民地社会凭藉英文的强势地位，享有较佳的出路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比较起来，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文化上，是相对地薄弱的。自廿世纪初至二战前，由于英校的增加，受英文教育的华人逐渐增多，华社的分化现象越为显著。³ 可见族群的凝聚力是以民族的特征为基础，而语文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可或缺；也可见母语教育在保护民族语文及特征方面的重要性。

除了教育背景之外，移民的先后也引起华社另一分化现象。华社的主要骨干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由殖民地当局一批批大量自华南引入以便作为开发经济所需的契约工人。在这之前的移民可追溯至明朝或马六甲王国之鼎盛时期。由于人数少及男多于女，早期移民多和土著民族通婚，结果其后裔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峇峇华人”的社群。峇峇华人多数在马六甲，他们不识华文，只讲马来语，但其词汇中拥有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以闽南语发音的单词；他们的日常衣着与食物已马来化，但在宗教、祭祀、节日、婚丧仪式方面还保留先代移民的形式。由于峇峇华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不曾被接受为马来人。他们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虽然失去了一些主要的民族特征（如语文），但还保留了另外一些。虽然和后至反而成为主流的华人有格格不入之感，但在社会承认（social recognition）上，他们是华人（因此在称呼上被冠之以“峇峇”）。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是一个具有文化特色的亚族群（subethnic group）；其特色是被马来族部分同化的结

果，但同化的程度似乎已到了极限（Crammer 1980）。

上述二战前已存在于大马华社的分化现象，时至今日还未消除。这些分化，再加上其他的分化（诸如社会阶级、宗教信仰、政治意识、或地域所引起的分化），对华社在不同的时代为争取族群权益、为适应改变的过程都起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的论说将不涵盖这一切。须要强调的是，这些分化并不影响华社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和其他族群有所区别；相反的，他们却肩并肩地作息，互相交流，而共同形成了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社会的一员。

构成这个多元民族的马来西亚社会，主要是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⁴统称为“印度人”的社群包括许多来自印度次大陆（南亚）的族群，其种族、语言、文化、宗教都呈现多元状态，其中以多数信仰兴都教，少数信仰伊斯兰教的淡米尔人（Tamils）为最大多数。淡米尔人也和华人一样，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大量引进，应付发展橡胶业所需的劳动力。印度人的社会也和华人社会一样，在体制建设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只是规模较小，经济成就也较低。

由于大量移民的涌至，更由于多数的移民在契约期满后，因母国政、经情势没有改善，而决定继续居留从事各种营生，一个各族杂居的多元社会便在大马形成。在同样的情况下，在东南亚各国（包括未被殖民的泰国）也出现了这类多元社会。这些多元社会的各民族生活在威权性的殖民地政府的主宰下，各有其经济活动领域，只在市场上作有限的商业性的交流。⁵因之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多数局限在衣着，食物、及词汇的互相假借的层次上。因此各民族间缺乏足够的凝聚力以产生对塑造这个多元社会的前途的共识，而这种情况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延续。

从廿年代开始，民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思想在马来社会开始萌芽滋长。反对殖民统治、反对殖民地政府自中国及印度次大陆引进劳工的言论便开始了。马来知识分子不满移民喧宾夺主剥夺了族人的经济机会，更担忧社会多元化会使他们难以落实建立以马来族为主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马来亚各族间的关系趋于紧张。⁶

在华族方面，主要是通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民族主义及反

殖民主义的思潮其实更早已在华社升涨；不过由于政治与文化上都认同于中国，有关活动也导向于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受到建设新中国的鼓舞，华社以兴学、办报、结社来强化本身，打下了二战后华社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虽然如此，1927年以后，国共分裂，中日对抗以及抗日战争（1937-1945），华社情牵祖国，不知耗费了多少资源。同时本身又因意识形态而闹分裂，无法同心协力建设族群文化，更无法思考族群和它所寄托的多元社会的前途。

马来西亚华社在二战前的发展情况简述如上。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东南亚各国的华社也一一发展起来。不具任何政治、经济、或军事的优势，只靠本身的血汗以及对祖国文化的一份执着与认同，把社群组合起来的文化得以在陌生的土壤移植扎根，开花结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在各种机缘巧合下何以致此？机缘之中当然包括西方殖民地主义在东南亚的经营。由于民族自主、民族独立、及打倒殖民主义的呼声日趋激烈，殖民地统治终有烟消云散的一天。再加上太平洋地区战云密布，这些东南亚的中华文化支流的前途更是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变数。何者有能耐通过一个新时代的考验？何者没有？

二、独立后国家政策对华人社会及文化的影响

二次大战结束后，亚非各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当家作主的都是各国主要的土著民族。由于东南亚社会的多元性，整合各民族以建构一个团结的国家便成为当局者的当务之急。在整合策略上，土著政治精英有两项基本假设：社会的多元性是团结全民的障碍；一种单一的国家语文（National Language）不只是国家的重要象征之一，而且是团结国民的主要工具。这两项假设的诉求可以从“一种语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看出来。这个口号的政治思想意识和多元社会内非掌权民族要持续母语教育、族群文化的愿望有尖锐的针对性。其实这样的构想已经于本世纪廿年代由印尼的民族主义者提出，并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响应（Radin Soernano 1960; and Roff 1967）。在马来西亚，马来语文是宪法上规定的惟一国家语文。印尼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爪哇人主宰国家机器，人口最

多，马来文却被选为国家语文，而改称为印度尼西亚文。这是因为马来人虽集中于苏门答腊岛，其语言却广泛流行于印尼各地，不象爪哇语言只局限于爪哇岛。菲律宾拥有好几个主要的土著语文，各有其流行区域，结果达迦洛文（Tagalog）由于相对地比较流行而被选为国家语文。

单一国家语文的政策意味着学校及各种教育机构将采用国家语文作为单一的教学和考试媒介。在多元社会出现的多元教育系统，各有其不同的教学媒介，被视为有碍于国家整合，而不被允许继续存在。在印尼、菲律宾及泰国，华社所经营的华校都先后被政府封闭，华人子弟从此失去了学习母语的机会。印、菲、泰三国中，以印尼的情况为最严峻。1965年印尼共产党政变失败，中印两国关系大逆转，印尼政府严厉禁止中文书刊、电影、唱片的发行或销售，以及中文在公共场合、经济领域的使用；进入印尼的旅客也不准携带中文出版物，或附有中文说明及广告的商品。⁷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统治，却于两年后仓促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该国华族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以华族为基础，领袖多为华人。新加坡以马来文为国家语文，以马来文、华文、英文、及淡米尔文为官方语文。可是在国会、内阁、法庭、及政府行政机构，大量使用的是英文。由于新加坡的经济以国际贸易为基础，英文也是私人界的通行语文。影响所及，人民多注重英文，造成其他源流的学校逐渐萎缩，只有英文学校不断发展。目前该国的学校大部分以英文作为教学及考试媒介。不过各校都有第二语文（或学生母语）的教学，华族子弟尚有学习华文的机会。

新加坡和印、泰、菲三国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而马来西亚可说是介乎两者之间，但偏向于后者。原因是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民族主义者彼此渊源很深，都以“一种语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建国目标。因此，独立（1957年）之初，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马来文为单一国家语文，但马来文和英文并列为官方语文。后来英文失去官方语文的地位，马来文成为惟一的国家语文及官方语文。但和印尼不同，宪法明文规定各民族有学习及使用母语的基本权利。

上述在宪法上对语文的安排，以及有关各族权益的各种保障，是独立

前马来各州苏丹代表、华巫两族领袖在英国政府的安排和仲裁下通过一系列协商而达致的结果。这些权益的保障都以制衡的形式出现。其中重要的是伊斯兰教为国教，但马来西亚是个世俗国，人民享有信仰自由；国家元首由马来苏丹担任，并保留各州苏丹制，但政体是基于定期普选的国会民主制；马来文是国家语文，但各族享有学习及使用母语的权利；马来人享有固定之特权，但各项特权有明确规定，而且定期检讨（Means 1976）。

这些制衡式的权益安排，大体上确保了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种族关系和谐的国家。在落实的层次上，难免有困难和偏差，最重要的是：配合语文政策而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如何直接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

在日本占领东南亚时期（1941-1945），马、新的华校，连同英校、印校和马来学校，在一纸通令下，全部关闭。接下来学生只学习日文。和平后，华社不只复办原有的华校，在各城镇更开办新校，其中有一些是中学。其他源流学校也在政府的支助下恢复旧观，英校的数目也大增。可以说，战前的多元教育体系已全面恢复并扩展。1955年当新、马华社在陈六使先生的号召下成功地在新加坡开办南洋大学，华文教育在东南亚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顶峰，但居于顶峰的日子却不长久。从国家独立开始，政府即策划教育制度的改革。改革工程是渐进的，方法是将多元的学校体系单元化。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单一体系，以马来文作为惟一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大学及其他各种教育机构（如师训学院）。

几次教育法令的施行对多元教育体系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英文小学、中学、及其他以英文为媒介的教育机构逐渐由低年级至高年级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到1978年，所有的英文学校全部改制成为以马来文为媒介的“国民”小学或中学。二是其他源流的学校（华校及淡米尔学校），只有在小学的阶段可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称为“国民型”华文/淡米尔文小学。因此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中学（即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没改制的称为华文独立中学，或简称独中，还允许存在，全国计有60多间。）可以说目前中学及大学已单元化，只有小学保持多元，但少了英文源流。必须指出的是，在国民中学里，华文是被允许作为一个学科来教授与学习

的。而在全国九间大学中，马来亚大学设有中文系，类似欧美大学里的汉学系。

教育系统单元化的最终目标还未达致，目前的状况还算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阶段。根据教育法令 21 条 (2)，教育部长可于适当的时候将任何国民型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以便体现教育体系单元化的目标。华社对此一条款一直感到不安。⁸ 目前全国共有一千两百多间华文小学，和国民小学的比例大约是 1:4 (《教育指南》1994)。华小毕业后，学生多数在国民中学继续学业，转入华文独立中学的在比例上为数不多。因此相信目前华族青年过半不谙华文，谙华文者，多数只有小学程度。⁹ 这是大马华人社会及其文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的因素。

除了建构国家教育系统外，在经济及文化方面，以马来民族主义者为主的国家政治精英也有宏图大计，也直接影响了华族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先说经济，1971 年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有两大策略，即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但主要的目的是纠正土著和非土著在经济上的不平衡（收入、就业、国家财富的拥有权及控制权），以便塑造一个团结和稳定的国家。这项政策的理论基础得到各族的认同。为实施这项政策，政府援引宪法给予马来人特权的规定制定“固打制” (quota system)，让马来人（及其他土著民族）享有更多的教育和训练机会，比如大专学院入学学额的分配、大专学院内各课程（尤其是专业课程）的学额分配、奖学金的颁发等。经过了二十年，种族间在经济（以及在人力素质）的不平衡大致已消除，为种族和谐及国家团结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¹⁰ 不过，在这期间，相对而言，不少华族子弟难免因学额有限而失去大专的训练机会。目前在学术的领域内，华族的人材非常缺乏，（从本国国立大学学术人员的种族比例中可看出），这对华族文化的建设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再说文化。1971 年马来知识分子开文化大会拟定国家文化三原则：即国家文化应以土著文化为基础；伊斯兰教必须成为国家文化重要的一环；其他文化因素，如果被认为适当，可被接受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¹¹ 接着下来，政治领袖及学者有关国家文化的言论，以及官方有关文化、语文的行政指令使华社感到不安。再加上七十年代中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运

动蔓延到马来西亚，各族间对国家文化的争论有加剧之势。华社认为政府的文化政策只侧重马来文化及伊斯兰教，并以同化或半同化为导向，深恐华人文化日趋式微。¹²

以上有关教育、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都是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发生的。在这期间，华社觉得文化、教育、及经济方面都面临各种限制和危机，在政治上更感无力。1983年全国27个具代表性（全国或州级）华人团体向当局及各主要政党呈上一份联合宣言，将华社在政、经、文、教各领域之诉求加以总结。这份宣言可以反映华社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科学等价值之崇尚，对民族语文及教育之爱护，以及对民族文化之执着及高度认同（《华团宣言》1985）。

三、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迈向廿一世纪的展望

1980年代末，国外及国内都有一番大变化，进入九十年代，变化的趋势更为明朗，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及其文化的前景如何，这里将加以探讨。

虽然渊源于中华文化，马华文化实际上扎根于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社会诸多民族文化（ethnic culture）的一种。它的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国家宪法必须保障各族人民学习及使用其母语，以及保存其文化、宗教、习俗的基本人权。马来西亚的宪法保障了这项基本人权，独立以来政府也尽可能落实它，因此各族文化得以继续发扬，国际上也有定评。

除了宪法的保障作为必要条件外，马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看华社如何在主观意识上作出适应。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国际社会和马来西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给马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契机。

从八十年代开始，东欧的变天和苏联的解体，影响了人类生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终于结束了。这无疑是一个大变局，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时众说纷纭。无论如何人类似乎有了这样的共识：民族不只要解放（独立），还要开放；不开放固然不能取得发展，开放却是每一个民族迟早必走之路。开放是为了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先置一旁。新时代的列车轰然待发，适者生存，每一个民族都想及时登上它。

这一个大变局对马来西亚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冲击。斗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和马来西亚政府于1989年12月3日在泰国达致协议,放下武器。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马中关系最后的一个重要障碍已被消除,两国实质关系更上层楼,双方之交流从此逐渐扩大和深化。另外,友族对华裔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效忠仅存的一些疑虑,至此已消除;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不存芥蒂。最后,马来西亚此后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建设国家。这项和平协议给马来西亚带来祥和的气氛,有利国家及华社的发展。

但马华文化在廿一世纪的前景还需要有另外一种情况出现,那就是: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具有继续发展的能力和信心;各族之间互信互重。独立之初,各族拥有自信又能互信互重的情况并不理想。主要的原因是马来人在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远远落在华人之后。此外,作为国家语文的马来文,势单力薄,只有马来人在小学阶段学习(其时还没有马来文中学)。各方面的落后和马来人拥有的政治权力不相配。在殖民统治下数百年的马来民族要独立,还要强大,以便在一个多元社会和其他民族并驾齐驱,才会有意义。于是,当家作主的马来人通过国家机器制定各种政策扶助马来人,将马来人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马来语文现代化,并建立它在教育体系中的优越地位。此外,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国家文化的概念下被提升。这是一个重组社会的艰巨工程,它的顺利完成,将有助于各族(特别是马来人)建立其信心,从此互信互重,一齐建设国家。

到了八十年代末,马来社会有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一个马来中产阶级已经产生了。马来人的政治力量牢不可撼,在许多经济领域里已超越了华人的成就。在文化、教育、工艺、医药等领域里,马来专才辈出;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马来学者更占绝对优势。进入了九十年代的马来民族已有信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他族公平竞争。对马来西亚来说,一个新时代的序幕从此展开。刚好世界各国也因冷战的结束而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注重经济发展,意识形态靠边站的开放时代。更开放的世界充满更多的机会和挑战,每一个民族都应重新定位,策划将来,以免被改变的巨涛所淹

没。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于1991年2月发表“2020宏愿”，可以说是马来西亚迎接新时代的一个建国大蓝图（Mahathir 1991）。

根据“宏愿”的九大纲领，马来西亚将以三十年（1991-2020）的时间成为一个科技、经济、文化、道德各方面有均衡发展的先进国。“宏愿”受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及马来知识精英的种种质难，首相接着于同年11月发表“为什么需要‘新马来人’？”说明将以伊斯兰教的优良价值观塑造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新马来人。他们将具有可贵的文化特质（受过教育、有知识、高雅、忠实、有纪律、可信赖、有效率），有力地促成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功，以优厚的文化能力面对廿一世纪的思想、文化、经济挑战。¹³ 新马来人将是立足东南亚，胸怀亚太，放眼世界的世界性族群（global tribe）。

“2020宏愿”和“新马来人”这理念的提出标示了马来民族的自信和远见。因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新经济政策”已被侧重建立科技社会的“国家发展政策”所取代，教育大改革正在策划中。由于政策较前开明，经济、教育、文化的许多课题这几年来的争论性已经大减。此外，马来西亚在过去八年来在低膨的情况下连续获得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在可预见的将来，她将成为亚洲另一条小龙。“宏愿”的落实已有了一个好开头。总之，上述大、小客观环境的演变和配合，使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对前途感到乐观。马华文化的发展前景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新马来人”和“2020宏愿”的概念显示马来人对其族群的前景和文化建设工作有很缜密的构思。相反的，当今的华社却显得群龙无首，缺乏足够的论述，更缺乏统一意识。本人在此采撷一些华社知识精英的意见，¹⁴ 加上自己的，将廿一世纪发展马华文化的一些理念整合出来，以供参考。

马华文化的定义和定位：

“马华文化”是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文化，是他们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为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所作的思维及行动的模式和因之而产生的精神与物质成果。马华文化是“文化中国”的一员，也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

诸多族群文化的一种。这样的陈述引起下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构成马华文化的主体是什么？如何发展它的主体性（文化建设的方向）；它和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本国各族群文化的关系与互动等。

文化基建工作：继续发展华文教育

华文是马华文化，或其他华人文化的界定性元素，也是传承有关文化最有效率的媒介。语文是文化之魂。东南亚其他各国华人文化式微，最终被同化，都是因为华人被剥夺了学习华文的机会。因此，华社必须鼓励年轻的一代学习华文。华社必须继续发展华校，从小学到大学，让各地华裔子弟有学习华文的充分机会。由于华文的经济价值日增，近年来马来领袖甚至鼓励其族人学习华文以增加作为一个世界性族群的竞争能力。¹⁵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为落实“2020宏愿”，将有一番大开放。华文教育的发展机会比任何时刻更好，华社应有系统地策划华文教育在廿一世纪的发展。华文教育是马华文化的基础建筑；华文教育的发展是马华文化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

文化软体发展：培养人文及社会科学人才

前文述及马华文化之素质偏低。华社亟须设立各式基金培养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华社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学者为国家及族群分析问题，作学术性的探讨，并在思想上引导社会。华社也需要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丰富族群的社会文化生活。这些文化软体一时还没有“市场价值”，但当“宏愿”落实，经济发展加速、物质生活富裕时，他们将会发挥理性化、优雅化社会文化生活的功能。

文化硬体建设

长久以来，华社的资源主要用在发展华文教育，文化硬体不多也欠完善。有三方面可探讨：第一、华社的文化团体很多，在组织上、活动上可

进一步加强；第二、高等教育机构、文物馆、学术研究中心、资讯中心、艺术馆、文化表演中心等不是付诸阙如，就是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惟一实例：在吉隆坡的华社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充实其硬体、软体设备）。过去几年陆续有各种建议，但尚无实质进展；第三、各种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研究基金有待建立。

资源的筹划

文化建设工作是昂贵的；没有充裕的资源，根本无法进行。华社为了发展华文教育，负担已告沉重，无法从事文化建设工作。再者，华社一向自力更生，在文教事业方面，无法依赖国家资源、因此，如何筹划资源应有新思维、新策略。一般人的看法有四：一、华社创办一些企业，以其盈利资助文建；二、鼓励现有华资企业有系统地资助文建；三、以企业之方式管理文化机构，使其自给自足；四、设立文化基金，向政府申请免税，鼓励私人界资助文建计划。

华团的革新

文化建设工作主要将由华团负起，这是华团迈向廿一世纪的一个重要挑战。历史悠久的华团亟需新精神、新文化以开拓华社的将来。为加强华团的运作和功能，华团应进行四项具体工作：如定位与功能的重新界定；组织的合理化、民主化；运作和行政的现代化；以及善用本身资源并以企业方式来管理，以便产生新资源。¹⁶

华社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马华文化的建设工作，也是国家的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目前大、小客观环境的改变对华社有利，相信在各族具有共识的情形以及族人的努力下，“梅花香自苦寒来”，马华文化也许会有灿烂的明天。

注释

- 1 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之著述甚多，此处无法详列。欲知概况，可参考 Wang (1959); Lim and Gosling (1983)。有关之文献目录也有数种，可参考 Suryadinata (廖建裕) (1989)。
- 2 有关东南亚华人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之辛亥革命，可参考 Yen (1976)。有关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可参考李恩涵 (1985)。
- 3 有关多元教育系统对马来西亚社会及其中华人社会的分化现象，可参阅 Loh (1975) 与 Chai (1977)。
- 4 马来西亚 1995 年总人口约两千万人。其中马来人占 62.37%，华人占 28.85%，印度人占 8%，其他种族占近 1%。
- 5 有关“plural society”（多元社会）一词之发现及描绘，见 Furnivall (1941)。
- 6 有关马来民族主义之兴起，可参考 Roff (1967) 与 Radin Soernarno (1960)。
- 7 有关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之语文和教育政策，及此等政策对华校、华人之影响，可参考 Hunter (1966)。
- 8 有关马来西亚教育改革之内容及进展，可参考 Wong and Gwee (1972)。有关教育改革对华校之影响及华社之反应，可参考 Kua (1985) 及 Tan (1985)。
- 9 国民小学或中学，虽有学生母语班之设，但因种种原因，无法开班，成果不大。
- 10 新经济政策之目标载于 *Second Malaysia Plan, 1971-1975*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71)。另参阅 *Mid-Term Review of the Second Malaysia Plan*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74)。
- 11 马来西亚文化、青年、体育部出版，*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国家文化的基础）（吉隆坡，1973）。该文件是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Tun Abdul Razak）在文化大会上的开幕词。
- 12 有关华社于八十年代对国家文化政策之评议，参考陈祖排主编（1987）。
- 13 这是马哈迪首相于 1991 年 11 月 8 日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常年大会的一篇演讲词，载于《南洋商报》，1993 年 10 月 9 日，〈言论版〉（刘务求译）。
- 14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于 1994 年 12 月 11 日主办“迈向 21 世纪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讨会，可见华社正在思考其文化之建设工作。
- 15 目前有超过三万五千名非华裔（其中二万七千名是巫裔）学生在华文小学就读。见《亚洲周刊》，1995 年 9 月 3 日。
- 16 华团亟需革新向来为一般人之共识，但却缺乏有系统的探讨。今年结束之前，在吉隆坡有两场研讨会讨论华团之“新文化、新精神”：一、1995 年 9 月 24 日，由全国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堂联）主办；二、1995 年 10 月 14 日，由二十个地缘性、血缘性团体，及华社研究中心联办。

参考书目

- CHAI Hon Chan 1977.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Monograph No. 6.
- 陈祖排 (主编) 1987. 《国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国家文化的理念》。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 CRAMMER, John R. 1980.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FURNIVALL, J.S. 1941. *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71. *Second Malaysia Plan, 1971-197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74. *Mid-Term Review of the Second Malaysia Pla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GWEE Yee Huan (魏维贤) 1972.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ts transpla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收于 *Southeast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的东南亚》), Bernhard Grossman 主编. Wisbadan: Otto Harrasowitz.
- 《华团宣言》1985. 吉隆坡: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 HUNTER, Guy 1966. *South East Asia: Race, Culture, and 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教育指南》1994. 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 KUA Kia Soong 1985.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A Protean Saga*. Kuala Lumpur: United Chinese Schools Committee Association.
- 李思涵 1985. 〈新马华人抗日救亡运动〉。《南洋学报》第 40 期, 页 1-42。
- LIM, Linda Y.C. and GOSLING, Peter (eds.) 1983.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I: Ethnicity and Economic History and Volume II: Identity,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gapore: Maruzen Asia.
- LOH Fook Seng 1975.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 Policy in Malaysi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HATHIR, Dato Seri Mohamad 1991. *Malaysia: The Way Forward*.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 Kuala Lumpur, February 28.
- MEANS, Gordon P. 1976. *Malaysian Politic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Ministry of Culture, Youth and Sports 1993.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国家文化的基础》。Kuala Lumpur.
- ROFF, W.R. 1967.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RADIN SOENARNO 1960. Malay nationalism 1896-191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 (1): 1-28.
- SURYADINATA, Leo (ed.) 1989.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TAN Liok Ee 1985.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45-1961*.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 WANG Gungwu 1959. *A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Ltd.
- WONG, Francis Hoy Kee and GWEE Yee Hean 1972. *Perspec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YEN Ching Hwang 1976.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